



凯丰这个名字,只在《毛泽东选集》中看到过,《反对党八股》一文开篇就提到他,对于他的经历却是一无所知。看了电视连续剧《长征》才知道,凯丰原来是博古的相当卖力的支持者,不仅在遵义会议前支持博古推行左倾路线,而且在遵义会议后,仍屡屡责难毛泽东,口气咄咄逼人,话也说得相当刻薄。想到数万红军因为左倾路线而被动挨打多有伤亡,就感到这凯丰的可恶。

使我渐渐改变这种憎恶情绪的是在此之后的事。尽管思想抵触,凯丰——当然还有博古和李德——还是和中央红军一起爬了雪山,过了草地,受尽了种种磨难。尤其是在俄界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由毛泽东当红军统帅,博古投了赞成票,凯丰也表示赞成,并宣布他在遵义会议上说的话统统作废。此时,我又感到凯丰也有几分可敬几分可爱。

说凯丰也有几分可敬几分可爱,是因为他知错就改。要做到这一条其实并不容易,战胜自我有时甚至比战胜敌人还难。有些人——例如王明和张国焘——就是因为顾及个人的尊严威信或权力地位而文过饰非,而强词夺理,以至于一步一步地走向自己的反面。在长征的过程中,凯丰的思想也进行了一次长征,他痛苦却又痛快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使红军摆脱了困境,于是与博古一起抛弃了对于毛泽东的种种偏见和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迷信固执。仅凭这一条,就能表明他(以及博古)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

说凯丰也有几分可敬几分可爱,是因为他改得真诚。有些人的认错改错,乃是因为大势

凯丰也有可爱处

宋志坚



所趋而“咸与维新”,这样的人其实只能归入所谓“识时务者”一类,他们识的是“时务”而不是自己的过错,因而一有机会就会故态复萌,在中共党史上这样的人就很有有一些,这种假洋鬼子自然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凯丰和博古显然不属于这一类。看了《长征》这部电

视剧知道,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其实还是很艰难很尴尬的,至少张国焘还在闹独立,张国焘的部下还敢气势汹汹地策马追赶毛泽东。凯丰和博古是在这种情况下抛弃自己的偏见和错误的。此中没有功利的权衡,只有对真理的认同与服从。

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这话不仅对犯错误的人有意义,对待犯错误的人也应当有这样的的大度。谁也难免会犯错误,尤其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革命的路到底怎么走,大家都在摸索之中,即使你摸到了规律,也极有可能一时难以所有的人认同接受,因而引起争论发生冲突都不足为奇。别的不说,就在长征路上,除了博古,除了凯丰,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的,也还可以找出几个,林彪不是提出要把毛泽东从红军指挥的岗位上撤换下来吗?徐向前不是在中央红军连夜北上时还请示张国焘“我们打不打”吗?如果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就永世不得翻身,那么,你就是真的一贯正确,也会成为孤家寡人。

查阅《毛泽东选集》中对于凯丰这一条目的注解,上面是这样写的:凯丰(1906—1955),又名何克全,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处说的“当时”,乃是1942年。凯丰在“当时”还能身居中宣部代部长之要职,可见那时确是按照“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去做的,所以革命队伍才会不断壮大。如果放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在历史上如此“疯狂反对”毛泽东的凯丰,一定在劫难逃。

好在于这沉重的一页,总算已经翻了过去。